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杨红,张天慧.大运河非遗活态传承利用杭州拱墅段经验[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4(1): 24-28.

大运河非遗活态传承利用杭州拱墅段经验

杨红 张天慧

(中国传媒大学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北京 100024)

摘要:大运河沿线分布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实现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利用,不仅是当代非遗保护的目标指向,也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关键要素。位于京杭大运河南端终点的杭州拱墅段,在探索大运河非遗活态传承利用的路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有效地盘活了与非遗相关的地方经济发展业态,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并带动了区域百姓就业,其经验对于运河沿线其他地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利用;拱墅段

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1)01-0024-05

201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大运河不仅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距离最长的人工运河,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大运河全长3200公里,途经8大省份,其构成共分为3大部分,即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以及浙东大运河。见证2500余年中华发展史的大运河,不仅促进了南北区域间的航运交通、商业贸易以及人口迁徙,同时,还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珍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存量可观且特色鲜明的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1]。非遗的活态传承利用已成为当下的时代课题,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利用,不仅可以反哺非遗的保护传承,同时还蕴藏着深厚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目前,位于大运河南端终点的杭州拱墅段,在非遗活态传承利用方面做了多重探索,其实践经验对于运河沿线其他区域具备一定的借鉴价值。因此,通过案例研究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总结,对于上述时代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大运河非遗的阐述

(一)大运河非遗的概念

关于大运河非遗的概念,当前学术界尚未给出统一界定。部分学者立足自身研究,对此做出了较为宽泛的定义。李永乐、杜文娟提出,由大运河生产、生活方式孕育而产生的,或者其内容反映大运河生产、生活方式的,或者其形成、传播依赖于运河环境的,都可以被界定为大运河非遗。^[2]言唱认为,大运河非遗是分布在大运河沿线区域范围内,且其形成、发展、传播、传承或演变与运河存在必然联系,受到运河本体或运河功能直接或间接影响的非遗。^[3]顾希佳认为,广义上的大运河非遗包括“在大运河流域广大民众中间世代相承的,与这一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4]。

本文中的大运河非遗,是指布局于大运河沿线区域内,其传承与演变与大运河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且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发挥重要当代价值的非遗资源。首先,就地理分布来说,非遗资源分布于大运河沿线8省区域内,同时,由一条主轴串联起五

收稿日期:2020-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丝绸之路新疆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流变分析”(219/17CH217)

第一作者简介:杨红(1983-),女,浙江湖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与传播研究。

大片区、六大高地的大运河区域,其非遗资源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其次,就形成动因来说,其生成、发展或演化与大运河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最后,就文化价值而论,运河非遗资源作为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活态传承利用对实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具有当代价值。

(二)大运河非遗的范畴

大运河非遗资源并非指沿线区域内全部非遗项目的总和,大运河沿线区域也并非一个绝对精确的地理范围。判断大运河非遗的关键不在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在于其形成、发展与大运河生产生活、环境功能的关联性。进一步来说,狭义的大运河非遗应当与大运河有相关性。自然地理空间范围中的资源确实存在偶然性,但是其与运河可能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度,因此,从人文地理空间范围去理解大运河非遗更为准确,即长期存在于大运河沿线地区,与当地老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非遗资源。^[5]根据关联性所呈现的由浅及深的特征,可初步将大运河非遗资源分为 3 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体现在大运河建设的过程当中,与运河主体或者运河原生漕运功能相关联的资源,例如以传统木船制造技艺为代表的传统技艺与实践技能等;第二个层面是与运河沿岸生活的主体,如沿岸居民、船工、渔民等有密切关联的非遗资源,如运河传说、民间故事、民谣等口头文学,以戏曲、音乐、曲艺为代表的传统艺术资源以及以秦淮灯会、河上龙灯胜会为代表的非遗民俗节庆资源;第三个层面是在交通发达、区域联动加强、商贸往来日益密切背景下诞生的传统技艺类资源以及传统医药类资源,其中已形成巨大社会声量

的非遗资源包括:宜兴紫砂陶制技艺、龙泉青瓷烧制技艺、宋锦织造技艺、雷允上六神丸制作技艺以及朱养心传统膏方制作技艺等。

二、大运河非遗活态传承利用的可行性

(一)非遗资源数量可观、特色鲜明

数量丰富且独具特色的非遗资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活态传承利用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显然,大运河非遗资源的活态传承利用具备良好的发展根基。首先,大运河沿线区域蕴藏着极为丰富且数量可观的非遗资源。2014 年国务院公布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大运河沿线的 8 个省市共拥有 832 项国家级项目,尤其是在浙江省及山东省,其项目数分别达到了 181 项及 130 项(见表 1),是非遗资源最为集中的沿线区域。^[6]其次,这些依托大运河历史变迁而诞生的非遗资源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一方面,大运河作为享誉全球的文化遗址,在其 2500 多年发展历程中凝练而生的漕运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商贸文化、船舶水利文化,都是大运河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显著元素,因此,这些伴随大运河流淌而生的非遗资源,被打上了鲜明的运河文化印记。另一方面,就大运河空间布局划分形成的六大高地(京津文化高地、燕赵文化高地、齐鲁文化高地、中原文化高地、淮扬文化高地及吴越文化高地)也分别拥有别具一格、独具风采的非遗元素。^[7]就元宵节习俗而言,京津地区与吴越区域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这些植根于大运河且风格迥异的非遗资源为大运河非遗的活态传承利用奠定了牢固的根基。

表 1 大运河沿线 8 省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统计

地区	项 目				合计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北京	13	48	12	16	89
天津	31	49	15	14	109
河北	7	8	5	8	28
山东	24	60	27	19	130
河南	22	45	12	18	97
安徽	19	28	12	20	79
江苏	37	44	24	14	119
浙江	39	73	49	20	181

注:数据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二)相关利好规划与法规的扶持

针对大运河非遗的活态传承利用,无论是国家

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均相继出台了相关的利好规划与法规。2019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颁布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合理利用作为长期的发展目标，将活化流淌伴生的文化以及阐发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作为工作内容加以展开。^[8]为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2017年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及《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等政策，强调完善金融支持政策以加强对非遗产业化的支持与服务。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的道路上，部分大运河沿线区域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且区域间因地制宜，根据区域非遗发展现状，出台具有适时性的针对性法规。例如，苏州、常州、淮安、宿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进行相关立法保护，无锡与杭州从历史文化遗产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有效保护。此外，镇江地区从非遗传承人视角进行立法保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益维护与利益保障提供支持，从而为非遗的活态传承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前大运河沿线区域已出台了相关的利好规划与法规，大运河非遗的活态传承利用已具备了较强的规划法规背书。

(三) 文旅融合背景奠定良好发展基础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旅游业的发展实现密切融合，在很大程度上为其今后的开发利用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力。文旅融合为大运河非遗实现活态传承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文旅融合背景下的非遗活化利用需要依托较为良好的旅游业发展基础，大运河沿线区域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近些年在运河旅游品牌的塑造上取得了系列成就，如苏州市打造的“吴文化重镇”品牌运河游，扬州推出的“古运河水上之旅”主题项目游以及以“传承古越文脉，展示水乡风情”为特征的绍兴市运河旅游路线，都为区域带来了可观的营业收入及游客量，与此同时，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也随之而完备。据相关部门统计，江苏大运河所在区县在2018年旅游收入为13247.3亿元，游客量达到了81823.7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突破了400万人次。^[9]另一方面，大运河旅游业的发展也为拓宽非遗资源的活化业态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传统研学旅游业相结合，非遗研学游由此产生，众多传统技艺类项目成为幼龄群体的重点体验对象，以传统技艺为核心开发的文创项目也因而备受低龄人群的关注。即便是开发力度

相对薄弱的民间文学资源、传统音乐舞蹈等非遗资源，在旅游业发展的牵动下，其与大运河旅游演艺产业相结合，进而实现活化利用的几率也会随之增加。所以，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为大运河非遗在当代的活态传承利用赋予了动能与生机。

三、大运河非遗资源保护利用现状

(一) 活化利用层次偏低且品牌意识薄弱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将为资源本身赋予更多的附加值，从而进一步提升资源的社会知名度以及经济转化效率。然而，层次偏低的开发以及薄弱的品牌塑造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对资源的价值造成了损耗，从而造成了运河非遗品牌匮乏以及资源滥用严重的局面。当前，多数大运河沿线区域在践行非遗活化利用之路上就显现出了上述局限性。一方面，这种局限性具体表现为沿线区域对非遗资源的不均衡开发。统计结果显示，大运河沿线区域蕴藏着丰富的民俗节庆资源、饮食文化资源、传统手工艺资源以及民间文学资源等，这些资源在当代均具备良好的开发契机，但是沿线区域尚未充分挖掘这些非遗的活化价值，尤其是民俗节庆资源与民间文学资源，仍处于开发的蓝海状态。^[10]另一方面，运河沿线区域对于非遗资源的粗浅开发及滥用，同样阻碍了资源的活化进程。这里就以非遗资源与旅游业的融合为例，非遗资源融合旅游业发展本是实现资源活化利用的良好路径，但是沿线区域仍停留在较为粗浅的开发层面，大多数立足非遗资源开发的旅游纪念品，仅是将非遗元素简单显现于物质载体，此类浅显开发模式势必造成同质化现象以及资源滥用、低价竞争等恶性循环。究其根本，还在于资源活化利用中品牌塑造意识淡薄，缺乏有力的品牌，非遗资源的衍生价值无从实现，因此，非遗资源的利用率及转化率也因开发层次的粗浅及品牌意识的薄弱而大打折扣。

(二) 资源缺乏多样化、持续化的保护利用与传播推广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利用与传播推广是衡量非遗传承利用的关键要素。大运河沿线区域不乏高活化价值的非遗资源，但是，对资源的传播推广尚未实施多样化及持续化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源活态传承利用的进展。当前，大运河沿线区域在非遗资源的传播推广及保护利用方面呈现出单一化的局限性。这里以区域内部分博物馆的展陈为例，博物馆为非遗传播的实现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支持与可观的访客流量,但是当前非遗传播路径仍选择单一的展陈模式,同时对于项目存在状态及特征的差异也未给予高度的重视。目前的展陈或是采用文字影像手段呈现,或是简单的道具陈设,非遗资源作为活态的传统文化资源,应当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活态展陈方式,在活态的传播中实现资源的活态保护利用。传播推广思路的单一性,将会对展陈空间、非遗项目声量及访客流量这些利好基础造成一定的浪费。同时,资源的保护利用与传播推广也缺乏持续化的策略,主要体现在传播行为随传播活动结束而停止,缺乏后续的系列传播动作。例如大运河文化带非遗大展,其传播推广随展陈活动结束而告终,尚未形成对非遗资源及传承人的宣传和营销的网络平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遗资源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三)社会力量参与和大众共享的态势尚未形成

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离不开多元社会力量的参与以及大众共享态势的形成。当前,大运河沿线各区域在非遗的活态传承利用方面,仍以政府资源投入为主,尚未形成由政府牵头的社会多方力量参与的格局,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大运河非遗的活态传承利用呈现出专业度匮乏、投入源单一等局限性,进而影响了区域非遗活态传承利用的效率与水平。原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在2018年两会上提出非遗保护要体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精神,非遗需要融入时代,融入生活,只有和群众生产生活结合起来,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要让人民群众“零障碍”“无门槛”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11]同样,对于大运河非遗而言,只有通过接触与互动,大众才会打破对于非遗的固有印象,并对原本陌生的非遗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进而才有可能建立情感联结并最终实现其本身蕴含的经济价值。

四、大运河拱墅段非遗活态传承利用的经验

(一)深度融合旅游产业,打造运河非遗品牌

在打造运河非遗品牌的过程中,杭州拱墅区将非遗资源与运河旅游业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充分践行了“非遗+旅游”的组合拳发展模式。就运河民俗节庆资源与旅游业的融合而言,拱墅区将半山立夏习俗与运河元宵灯会作为重点抓手。针对半山立夏习俗这一非遗资源的开发,拱墅区成功举办了数届“半山立夏节”,提升了“送春迎夏”古礼仪式、“送春迎夏”祭祀队伍、立夏称人、半山泥猫等项目的全国

知名度。^[12]对于流传千年的运河元宵灯会节庆资源的开发,拱墅区充分借助现代灯光展示技术,为家喻户晓的民俗节庆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及发展动力。如今,半山立夏节、运河元宵灯会已成为运河旅游路线的重要构成,与大运河文化节以及运河庙会共同形成了“春走大运,夏逛民俗,秋游庙会,冬赏花灯”的运河民俗游线路特征。^[13]此外,在饮食文化资源、传统手工艺资源与大运河旅游融合发展方面,拱墅区对于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修复,同样是一个范例。修复过程坚守“修旧如旧”的理念,以恢复“上寝下店”的明清传统商居样式景观。^[14]在此基础上,街区老字号及老店面得以全面恢复及重新利用,传统饮食烹饪技艺以及传统手工艺的打磨技艺在商铺林立的氛围中又一次获得了活化机遇。相关非遗项目也成为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这一拱墅核心旅游景点的关键构成,对于街区游客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综上所述,拱墅区在非遗活化利用过程中积极寻找与旅游业间的发展契合点,依托大运河杭州段完善的旅游业发展基础,为打造运河非遗品牌创造了机遇。

(二)实施多重策略,提升资源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拱墅区在大运河非遗资源的传播推广中践行了多重策略,体现出较强的活态性及适时性,良好的传播效果反向推动了活化利用的效率。在众多的策略中,博物馆对非遗资源的活态展示传播可圈可点。同时,借助新媒体平台持续对外输出运河非遗资源及传承人相关内容,以此进一步提升非遗项目知名度。就非遗的活态展示传播来说,拱墅区在2009年围绕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王星记制扇技艺、西湖绸伞制作技艺三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了全方位的活化展陈。首先,利用重工业时代的厂房建筑打造了中国刀剪剑博物馆、中国扇博物馆、中国伞博物馆以及手工艺活态展示馆,这些空间设施均为非遗资源的活态展陈提供了完备的条件铺设。^[15]以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为例,传承人手工操作表演72道工序,试钢、试铁、嵌钢、出头等工序的演示,将这项技艺的精湛独到之处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从而打破了原本只存在于文字简介中的流程静止展示状态,真正实现了活态呈现,有效提升了资源传播推广的深度。此外,充分借助新媒体平台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对大运河非遗资源及传承人,尤其是与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王星记制扇技艺、西湖绸伞制作技艺相关内容进行全方位的推广

传播。同时,拱墅区非遗资源展陈的集中区域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还利用了当下热门的直播平台抖音,进一步提升了资源传播的广度。通过策划非遗主题内容,在直播中还原时代场面,营造代入感,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非遗走进现代生活的活化目标,为非遗资源的展示与传播创造了更广泛的平台与空间。^[16]拱墅区非遗资源实现了深度与广度兼具的传播推广效果,与其多重传播策略的实施有着必然的关联,拱墅区积累的经验对于运河沿线其他区域也具备一定的借鉴价值。

(三)形成多元力量建设、大众参与的格局

拱墅区在非遗活态传承利用的过程中,既做到了引导多元社会力量参与建设,也形成了大众共享的态势。就多元社会力量参与大运河非遗传承利用而论,一方面,拱墅区建成了大运河文化研究院、大运河文化沙龙等学研机构,汇聚专家学者力量,从而提升了运河非遗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专业背书,突破了资源活化过程匮乏专业度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社会力量参与也体现在现代商业体的资源贡献。拱墅段桥西直街历史街区的重塑,在保留具有历史代表性的著名老字号店铺的基础上,也引入了已积聚强大品牌声量的现代知名商家入驻,不仅完善了历史街区的当代功能,现代知名商家的入驻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历史街区的建设输入了资金储备以及利用自身所带流量反哺老字号店铺的曝光率。^[17]就大众共享态势而言,拱墅区紧密围绕大众群体开展项目,将提升大众体验参与度作为一切活化项目展开的出发点,进而促成大众与资源间良好互动氛围的形成。无论是针对普通社区住户的“非遗进社区”活动,还是满足手工艺爱好者的,由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开办的“工艺美术大师带徒学艺”活动,上述活动项目均为普通受众与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及著名工艺美术大师创造了接触、切磋的机会,使其在潜移默化之中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此外,针对幼龄群体,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充分利用现代前沿技术营造沉浸式展览“南宋小百工”,极大地提升了幼龄群体的参与度与互动感。拱墅区在实现非遗活态传承利用的过程中充分地调动了社会力量参与,为大众接触、了解非遗创造了恰当的机会,进而也实现了较为理想的活化效果,这一点值得其他区域借鉴。

五、结语

存量可观、特色鲜明的非遗资源,利好政策的扶

持以及文旅加速融合的大背景,均为大运河非遗资源的活化利用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实现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活化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区域业态发展的多元化,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以及创造就业机会,提升区域就业率。针对当前运河沿线城市在非遗活化利用过程中存在的开发层次低且品牌意识弱,缺乏可持续化的传播路径以及社会力量参与度低等局限性,杭州拱墅段通过长期的实践摸索,在运河非遗品牌塑造、非遗活态传播及带动社会力量与大众参与活化过程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对于运河沿线其他区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此基础上,运河沿线区域应当立足自身非遗资源特征并结合地区产业发展优势,为实现大运河非遗资源的活化利用开辟一条高质量、可持续路径。

参考文献:

- [1]熊海峰,言唱.大运河:流动的文化带[J].前线,2019(8).
- [2]李永乐,杜文娟.申遗视野下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及其旅游开发——以大运河江苏段为例[J].中国名城,2011(10).
- [3]言唱.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活化利用[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
- [4]顾希佳.杭州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
- [5]柳邦坤.运河流域非遗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的思考——以江苏淮安为例[J].中国名城,2018(8).
- [6]范周,杨喬.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 [7]张秉福.京杭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关系的现状与问题探析[J].艺术百家,2019(3).
- [8]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J].城市规划通讯,2019(10).
- [9]姜师立.文旅融合背景下大运河旅游发展高质量对策研究[J].中国名城,2019(6).
- [10]姜师立.文旅融合推进大运河旅游高质量发展[N].中国文化报,2019-06-29(7).
- [11]王学思.大匠至心 传承至美[N].中国文化报,2018-03-23(8).
- [12]千古遗韵——古运河畔的非遗声音[J].杭州(周刊),2019(1).
- [13]范永晨,冷静,郑小兵,曾庆良.古貌神韵今又现 拱墅区倾力打造杭州历史街区保护的“样板”[J].今日浙江,2007(21).
- [14]范永晨,张军.关于运河旅游新品牌建设路径的思考[J].杭州(周刊),2011(10).
- [15]于路也.打造没有围墙的博物馆[J].观察与思考,2011(9).
- [16]杨红.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与传播前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 [17]杨萍.城市更新过程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拱墅区三大历史街区为例[D].西北大学,2018.

特约编辑 桑俊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